

医学人类学视角下《拉罗斯》中结核病和东西医学文化之争

蒋天平,李莎¹

(南华大学 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拉罗斯》是路易斯·厄德里克“正义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作品通过家族四代拉罗斯感染肺结核的事实,揭示了印第安民族被殖民的历史。文章从医学人类学视野出发,结合殖民医学视角通过分析肺结核的文化隐喻意义,批判了殖民统治的黑暗腐化,揭露了西方殖民者的伪善面目;同时,揭示了以西方医学科技和殖民医生哈尼弗特·埃姆斯为代表的西方理性带给印第安民族和文化的灾难,而印第安整体医学中的健康观、仪式疗法、音乐疗法所体现的人与人相互联系、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和谐、爱的文化整体观则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从而质疑了殖民医学的进步性、西方文明的优越性,批判了短暂的西方理性,并表明了东方医学整体观的有效性和文化的永恒性。

[关键词] 《拉罗斯》; 医学人类学; 结核病; 医学整体观

[中图分类号] I71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22)02-0107-08

DOI:10.13967/j.cnki.nhxb.2022.0031

路易斯·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1954—),诗人、小说家,当代美国著名的印第安裔女作家,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文坛崭露头角,她的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体裁包括诗集、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儿童文学,以及散文随笔,获得了包括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书评家协会奖、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在内的10余项大奖。《圆屋》《鸽灾》和《拉罗斯》共同构成了厄德里克的“正义三部曲”,《拉罗斯》一经出版,就被《波士顿环球报》评为“厄德里克最杰出的成就之一”。

医学人类学是采用人类学的理论、视角与方法对健康、疾病与治疗的相关知识与行为的研究,它还包括将人类学的知识用于解决健康、疾病与卫生保健相关的应用性工作。医学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大体有两端,一端侧重人类的生物性,形成了医学人类学的生物文化视角;另一端关注社会文化层面,形成了医学人类学的社会文化视角,社会文化视角下的研究构成了医学人类学的主体^[1]。因此,医学人类学超越了临床生物医学的范畴,而关注于人体疾患的文化隐喻和社会象征的探讨^[2]。殖民医学也称帝

国医学,是西方医学在特殊时期的变种。狭义地讲,殖民医学是指发生在殖民地上的各种医学实践或相关的各种权力、机制和社会阶层活动,以帮助殖民者克服他们在殖民地上所面临的医疗卫生问题^[3]。应该说,在殖民地背景下,与医学实践有关的各种机制、权力、社会阶层都可以归属殖民医学的内容。整体观念是东方医学最重要的特色,这个整体包括了人与自然界,人与社会,人体内部等等。许多古老的东方文化记载中,宇宙被视为一个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整体。疾病被视为与宇宙秩序不协调的结果。因此,疾病不能脱离其社会、文化和精神环境,这种医学方法被称为整体医学^[4]。

目前对于《拉罗斯》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修复式正义,如《〈拉罗斯〉中的正义主题再审视》(刘清华);族裔性空间,如《族裔性的空间建构〈拉罗斯〉中的叙事策略》(陈靓)、口头叙事与创伤,如《印第安口头叙事传统与创伤书写—厄德里克〈拉罗斯〉解析》(陈金星)。本文从医学人类学视野出发,结合殖民医学视角,分析《拉罗斯》中“肺结核”的文化隐喻意义,批判了殖民统治的黑暗腐化,

[收稿日期] 2021-09-18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罗宾·科克医学小说中的新帝国想象”资助(编号:19C1580);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罗宾·科克医学小说中的政治意识形态研究”资助(编号:19YBA293);湖南省基金项目“英语文学中的殖民医学研究”资助(编号:17YBA343);湖南省学位办研究生教育改革课题“美国文学专题”资助(编号:193YSK011)

[作者简介] 蒋天平(1972—),男,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后。

¹ 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第一高级中学教师。

揭露了西方殖民者的伪善面目;并通过健康、爱、仪式疗法、音乐疗法等讲述印第安民族的医学史;第五代拉罗斯用爱治愈了两个家族的创伤,也构建起两个民族走向和谐的桥梁,暗示了印第安文化中和谐、爱的文化整体观的胜利。

一 结核病文化隐喻

肺结核是一种常见的传染病。《辞海》对结核病的定义如下:“结核病”俗称“痨病”,结核杆菌引发的传染病。多由于呼吸道感染,偶见消化道感染。病理特征为结核形成和干酪样病变^{[5]22}。苏珊·桑塔格说,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5]68}。医学人类学通过对“疾病的文化隐喻与表征”的跨文化分析进而揭示出掩盖在人群疾病背后的历史结构、阶级分层、文化形态与社会过程^[2]。因此,小说中的肺结核不单单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疾病,也是与文化政治息息相关的疾病意向。肺结核的入侵,暗含了当地殖民的事实;同时,通过分析肺结核的文化隐喻意义,进一步揭示了西方殖民者的伪善面目,批判了殖民统治给印第安社会带来的灾难。

肺结核是一种常见的传染病。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肆虐时期,“传染病”和“殖民主义”总是紧密相连。印第安人在殖民统治之前,虽然遭受了各种疾病,但是却没有大规模的传染病侵袭,殖民者的入侵带来了大规模的传染病爆发。第一代拉罗斯起初是健康的印第安人,却在白人教会学校感染了肺结核。“一天晚上,名叫花儿的第一代拉罗斯在教会学校做过祈祷后……这时,结核菌也跟着爱丽丝上方飘过,新变异的结核菌混在爱丽丝咳出的痰里,猛地向前翻滚,跳过拉罗斯床上的栏杆,拉罗斯一吸气,病菌晕倒在她嘴里”^{[6]217}。之后,第一代拉罗斯感染了肺结核,同时,家族四代拉罗斯都相继感染了肺结核。亚瑟·杜勒认为,社会和精神层面都存在穿透现象,病毒可以威胁、穿透和摧毁个人的身体和思想^[7]。肺结核的传播隐喻了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印第安社会原本是一片健康的处女地,却由于白人殖民者的入侵,相继感染肺结核,从某种意义上说,肺结核是白人殖民印第安人的创伤印记。同时,小说中通过几个情节描写,进一步揭示自从殖民入侵后,西方殖民者对印第安人持续不断的迫害。小说中第一代拉罗斯设计杀死麦金农,麦金农死后头颅不停追赶拉罗斯,头颅的追赶隐喻了西方殖民者对印第安人持续的迫害并且这种迫害无处不在,正如

第一代拉罗斯的父亲所说,“白人已像虱子一样遍布大地”^{[6]344}。另外,罗密欧与朗德罗为了摆脱寄宿制学校的控制,选择逃离,最终还是没有逃离控制,被再次带入寄宿制学校,寄宿学校是白人压迫印第安的机构,而逃离的失败隐喻了印第安人反抗的失败。

苏珊·桑塔格认为,中世纪对传染病的体验,摆脱不了道德污染这类顽固的观念^{[5]80}。由于病因不详,“肺结核”成了几乎所有问题的代名词,当它与财富、阶级、种族、宗教、道德等牵扯后,它就不单单是单纯的疾病,它叠加在已有的社会差异上,成了穷人的疾病、东方人的疾病。小说中埃姆斯医生通过研究发现,“她的遗骨证明印第安人特别容易感染这种疾病”^{[6]240}。疾病成了划分种族的依据,成了“他者”的标签,道德沦丧者的代名词。小说采用“他者”的道德反写,颠覆了传统的疾病文学隐喻,突出表现了印第安人的高尚,揭露了西方殖民者的伪善面目。第一代拉罗斯患上肺结核,传统文学隐喻中,疾病与道德污名联系在一起,但是第一代拉罗斯却是一个充满爱的人,在逃跑途中,细心照顾生病的同伴,并且教给沃尔弗雷德印第安传统的生存知识,“女孩用手和脸检测气流,然后告诉沃尔弗雷德应该在哪里搭建斜棚屋,怎样确保房子避风……”^{[6]147}。知道自己患上肺结核后,主动将毯子拿出去晒,“病菌已经吞噬了她,她害怕病菌传染给孩子们”^{[6]223},体现了对孩子的爱。同时,积极传播部落医学和文化知识。“第一代拉罗斯去世前,她已教会女儿每到一处怎样找守护神,怎样用歌谣和植物治愈人们的病,饥饿难耐时吃什么根茎,怎么设陷阱……”^{[5]231},而特拉维斯神父是健康的白人,致力于保留地的精神创伤,实则道德堕落、虚伪。当诺拉由于遭受心理创伤向神父倾诉时,神父压根不听她讲话,因为在他眼中,诺拉只是家人的陪衬,无足轻重。却把关注点放在诺拉的身体上,“也许,他是留意到了她有些不对劲的,正如他也留意到了一个细节,这可能会让他睡不着。比如,那些薄薄的棉衬衫下隐隐透出的黑色胸罩”^{[6]99}。当诺拉说特拉维神父摸她胸部的时候,神父说,“你该清楚,我从不摸任何人的胸部”^{[6]102},但是却和朗德罗的妻子私通,暴露了神父的虚伪面目。

19世纪晚期,德国哲学家认为,政治和科学相互指称、相互依赖、相互利用,鼓励人们借用生物意向思考其他领域的问题^[8]。苏珊·桑塔格认为,“流行病通常被用作描绘社会混乱的一种修辞手

法^{[5]81}。传染病的大肆流行隐喻了社会贫困、原罪、政治腐败等问题。白人对印第安女孩的性侵、奴隶买卖的大肆流行,侵占印第安人土地、实行同化政策,战争频繁、恐怖袭击频发……特拉维斯神父经历了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的恐怖袭击,同时还是1986年贝鲁特兵营爆炸案的幸存者,朗德罗经历了军事战争“沙漠风暴”,第一代拉罗斯花儿被当做奴隶一样买卖并且被白人麦金农侵犯、玛吉遭到白人男孩的侮辱,四代拉罗斯都被送往寄宿制学校接受语言文化的同化、保留当地人所拥有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小。作者借用肺结核的隐喻意向,表达了在西方殖民统治下的印第安社会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批判了殖民统治的黑暗腐化。

二 西方理性的代表:医学科学、殖民医生

西方医学建立在解剖学、生物学以及现代科学技术上,倾向于将人体各系统之间看成孤立的存在,主要采取科学实验方法,从宏观到微观甚至分子基因层次进行各种实验研究^[9]。随着理性主义在19世纪的空前发展,西方医学在科学技术的推进下迅猛发展,超过其他任何一门医学科学,已经成为世界医学舞台的主角。作者通过艾玛琳对西式分娩方式的无声抵抗与罗密欧在医院探听各种有用信息,抨击西方医学科学打着“理性”的旗号,对本土人实行控制与压迫。

安德森认为,“所有的现代医学都关注病人的身体,都属于殖民”^[10]。随着西方社会 and 知识结构的改变,西方医学也开始涉足传统女性分娩的领域。科学、理性的产科学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人文关怀的助产士。小说中,描写了艾玛琳生产时使用的脊髓麻醉法,“艾玛琳不想用脊髓麻醉法,也不想用持续时间长的硬膜外麻醉,也不想因此患上头痛症”^{[6]338}。西方现代医学披上技术的外衣,实施对人的身体控制,驯化女性臣民。“后来她去卫生院产房看望朋友,被那里的气味刺激得血压飙升,双手颤抖,她头晕目眩,必须坐下才行,是身体的反应吧”^{[6]338}。艾玛琳的身体恐惧感是对西式分娩方式的无声抵抗。约翰·艾玛奇(John Ehernrein)认为,“现代医学并非道德上中立的、慈善的、有效的学科,它披着技术话语的外衣,又综合了各种社会信息”^[11]。西方现代医学通过权威的科学知识取得了话语权,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宗教和法律,成为了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小说中罗密欧是一个印第安瘾君子,为了复仇进入医院做临时工,探测信息。“罗密

欧看到这些消息就知道谁快死了,谁能活下来,谁比他神经质”^{[6]108}。现代医学成了监控“他者”的武器。罗密欧作为医院的工作者,发出这样的感慨,“这些消息意义深远,让他不安,作为一种附加福利,这些事无需他承担任何法律后果,这种权利远胜其他权利”^{[6]107}。

哈尼弗特·埃姆斯的白人身份,使他成了西方理性的代表。作者通过对埃姆斯医生的刻画,突出表现了西方理性主义的二元对立价值观必将走向衰亡。埃姆斯医生对印第安人充满了严重的种族歧视,热衷于肺结核的研究,当他发现东部的医生过于保守时,将实验室搬到西部,想要研究肺结核的传染与治疗。埃姆斯医生起初见到拉罗斯时,不肯收治她,因为她是印第安人,他认定她肯定治不好。这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种族科学主义全面推崇种族优越论,而白人天生是优等种族,印第安人属于种族链条的底端,注定受到殖民奴役。正如小说中所说,“如此有效地毁灭阻碍进步的印第安人,上帝的意志功不可没”^{[6]225}。“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印第安人相对于白人是劣等种族,疾病注定侵袭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注定灭绝。在临终前,他将拉罗斯的遗体标本捐献给历史协会,用于历史协会博物馆展览,却不考虑印第安传统文化中祖先遗体必须得到安葬的传统。印第安文化遵循万物有灵的传统,人死后灵魂要回归大地母亲,要举行安葬仪式。“历史协会博物馆中存放了众多印第安人的骨骼,有的是从墓地上挖出来的,有的是耕地、修公路时翻出来的,有的是给房子、银行、医院、宾馆或者游泳池打地基及建造时挖出来的”^{[5]240}。帝国博物馆展示科技优越性却忽视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整体观,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对立的分裂观。最后,博物馆中很多遗体奇迹般不见了,也预示着西方医学的二元对立分裂主义必将走向衰亡。

医学人类学认为,包括疾病在内的经验世界不是纯粹的客观实在,而是人们通过特有的文化透镜产生的认识,即便是生物医学体系也建立在特定的文化基础上,是一种文化体系与社会建构,而不是完全与文化、价值无关的科学知识^[1]。因此,以理性为主导的西方医学是西方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其哲学理论基础源自于培根(Francis Bacon)和笛卡尔(Rene Descartes)。笛卡尔和其他的逻辑学家认为非空间存在的心灵(mind)和空间存在的实体,不能统一存在。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引导下,西方社会文

化领域呈现科学/自然、理性/情感、身体/性灵(spirit)、白人/有色人种、个体/群体二元对立而非融合的趋势^[12]。小说通过白人家庭不和谐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以理性为主导的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生疏,从而抨击了以理性为基础,忽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小说中郎德罗和罗密欧在逃离寄宿制学校的过程中不小心来到了一位老太太的家里,他们看到这位老太太被她任性的儿子狠狠地骂了一顿,“我很忙,你别装作没听到,别转过头不理我”^{[6]197}。白人家庭中的不和谐关系使两个男孩感到震惊,“虽然他俩听过大人吵架,但老太太的儿子对着她连讽带刺,完全颠覆了母子间的辈分与礼数”^{[6]197}。这段破裂的关系是美国高度现代主义的结果,在那里人们过分专注于他们的工作,忽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与交流。就像儿子向他母亲抱怨一样,他不会被打扰,因为他手头有很多事情。白人家庭诺拉和女儿也经常争吵,缺乏恰当的情感交流,母子关系非常糟糕。“你还跟我顶嘴。我跟她说,那好,你回自己的屋子里待着,不准出来”^{[6]172}。“她早就出去了,根本不听我的”,诺拉生气地说,“她在吃早饭呢”^{[6]23}。“她看到诺拉使劲压着玛吉的头,简直要把她埋在冲燕麦片的碗里,玛吉反抗着”^{[6]23}。在逃离寄宿制学校过程中,有一段寄宿制学校外面景物描写,“没有车辆的噪音、没有城市的喧嚣,一切都归于沉寂。四周悄无声息,他俩听见河水不停地翻滚,奔到一处急滩、大坝或者瀑布”^{[6]240}。寄宿制学校外面的自由、和谐、恬静的场景暗指了印第安社会的和谐与恬静,这样的景象与白人寄宿制学校内压抑沉闷的不和谐的场景形成鲜明的对比,也是两种社会文化的对比。新冠疫情频发,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实行严格的监管措施,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东方医学文化传统;而西方社会采取全体免疫的方式,也是以“理性”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反射。

三 东方整体医学:健康观、仪式与音乐疗法、治疗师

医学人类学认为,我们不应该就疾病论疾病,而应该把疾病放在人们所处的文化场景中加以分析与理解^[4]。因此,疾病是人们透过其特定的文化背景来认识与体验的一种经历,它不仅仅是一种科学知识,同时也是一套文化价值体系,是文化与社会建构的产物。作者通过印第安整体医学中的“健康观、仪式疗法、音乐疗法、治疗师”挖掘出印第安整体医

学背后的文化内涵,东方整体医学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爱。作者通过描写东方医学治疗的有效性,与印第安治疗师重视与病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弘扬了和谐、爱、健康的东方医学理念,反写了西方理性话语。

印第安整体医学认为,一个健康的人是与他的社区、物质环境和超自然生物和谐相处的。不和谐可能在许多方面造成疾病^[13]。健康就是人类与周围环境保持和谐的状态,和谐是印第安医学健康观念的支点。健康是保持与周围环境的和谐与平衡,爱和宽容可以构建和谐的人类关系,“拉罗斯”这个名字蕴含着纯洁而强大的力量,常用来命名家族中的治疗师^{[6]13}。一百多年来,朗德罗这个家族里每一代都会有一个拉罗斯,作为家族的疗伤者。他们有着天生的治愈能力,在这个和谐的大家庭里面充当精神桥梁的作用。第五代拉罗斯的父亲郎德罗不小心射杀了彼得家的儿子,彼得是一名白人男子,诺拉几乎是白人“你把儿子送给这样一个白种男人和近乎白种人姐姐”^{[6]13}。郎德罗用印第安古老的化解创伤的方法,将小拉罗斯送给受害者家庭。“以后我们的儿子就是你们的儿子了,这是我们的老传统”^{[6]18},被送去白人家庭后,小拉罗斯用爱和宽容成功治愈了两个家庭的创伤,两个家庭的关系也从破碎走向和谐。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小拉罗斯不仅治疗了两个家庭,更治愈了两个民族断裂的关系,用爱与包容建构起两个民族的未来。同时,小说中白人家庭诺拉丧失生育能力,“达斯提出生后不久,她就从没来过例假,医生也查不出什么原因”^{[6]24}。唯一的儿子也不幸去世。而印第安家庭朗德罗却孩子众多。朗德罗开始的时候酗酒,还吸毒。“后来才清醒过来,我们想要个孩子”,“我们回到这里,恢复传统的生活方式,开始是为了摆脱酗酒的习惯,后来是为了家庭幸福。我们更加尊重传统的习俗”^{[6]299}。通过恢复传统的印第安生活方式,朗德罗夫妇迅速孕育了四个孩子,暗示了当地健康观的有效性,也暗示了当地文化超强的生命力。

医学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认为,人的交流与治疗仪式包含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潜能,象征性行为与语言在很多治疗仪式中的确会达到预期的目的,影响人们的身体与心理^[14]。在社会生活中,充满了冲突以及对冲突的恐惧或是对灵魂攻击的恐惧,包括占卜与治疗在内的“修复仪式”就是要揭示社会分裂的根源,调整社会关系的平衡^{[15]27}。印第安传统的仪式疗法通过加强部落家庭之间的联系,

平衡部落及家庭成员的关系,缓解死亡带给家庭及个人的冲突,更加重视宗教以及精神的力量,从而起到治疗的效果。在达斯提的忌日,他们在客厅举行了烟斗仪式,“他们一个个传递那神圣的烟斗,每个人接到烟斗后就将烟斗指向东南西北”^{[6]277},“朗德罗充满深情地摩擦着烟斗石。那红色是祖先的血液”^{[6]301}。达斯提的忌日全家人举行烟斗仪式,在传递烟斗的过程中祭奠逝去的亡灵。通过仪式,家庭的联系更加紧密,个人宗教信仰得到升华。当朗德罗不小心射杀了邻居家的小儿子时,为了祭奠他的死亡,化解内心的伤痛,他和妻子艾玛琳选择进行仪式治疗。“她和拉罗斯生起火,从一个特制的小袋子里取出烟草,连同古老的石块一同扔进火中。“将酒倒在两个人之间的地上。酒洒在地上,她唱起一首关于狼藉的古老歌曲,歌颂这位专门帮助绝望的酗酒者的神灵,呼唤那些叫得出名字的先人,向先人做祷告……”^{[6]11},“艾玛琳唱起颂歌,把草药倒进火里,召唤神灵……”^{[5]12}。最后,他们得到了修复两个家族破碎关系的古老方法。将小拉罗斯送给邻居家,化解两个家庭的创伤。正如小说中朗德罗的女儿所说,“在仪式上,人们会表露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情感,好让周围人为你祈祷、唱歌、为你提供帮助”^{[6]58}。

当地文化讲求内在的超越,主张以动态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把握世界,倡导在身体、心理、道德和精神层面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16]。因而人体的健康涵盖生理、情感、精神三个方面的平衡,涉及身体的、社会的、情感的、智力的、经济的、精神的等多个问题,而疾病正是这些方面失去平衡的结果^[17]。生物医学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与医学工程和生物技术的关系紧密,发展迅速,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主要领域,西方采用压制疗法、对抗疗法等治疗疾病,割裂人与外在自然环境的关系,将人与自然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印第安人认为,人体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因此,作为人体的小宇宙和作为“大宇宙”的自然界之间,存在“声气”互动的关系:自然协调则机体健康,不协调甚至过度便会产生疾病。而音乐在协调人体与自然界的方面起到重要作用^[18]。第一代拉罗斯和沃尔弗雷德在逃跑途中,沃尔弗雷德头晕目眩,体力不支,患上了重疾,第一代拉罗斯首先“照顾着他,搬木头、煮汤、给他保暖”^{[6]167},然后,花儿通过音乐疗法,治愈了沃尔弗雷德的疾病。她用高音走调地哼唱、用鼻音哀嚎,忽高忽低,平缓地重复着,“她的鼓励修正了他身体内

部的某个旋律,他的思绪惬意地放松下来,然后睡着了”^{[6]168},“夜幕降临时,他睁开眼,发现这个世界不再摇晃”^{[6]168}。第一代拉罗斯通过音乐疗法治好了沃尔弗雷德的疾病,体现了印第安文化中重视人与自然的联系,通过音乐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消解了西方医学文化中理性主义,西方医学理性将人与自然看成割裂的存在。

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指出,病痛是一种文化建构,作为一种心理—社会经验,这种建构包含复杂的心理与社会过程,这一过程反过来又会影响疾病,并在治疗疾病与病患的过程中发挥作用^[19]。治疗的艺术和医患关系在改善病人健康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优秀的治疗师在治疗疾病的时候,更加关注患者的情感心理体验。医生朗德罗对待病人无微不至,注重病人的内心感受,与病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巴普不愿让丈夫去康复中心,朗德罗就选择上门给她治疗。并且给他冲澡、帮他上厕所,给他吃药、打针、喂他吃饭,给他修理鼻毛和耳毛,剪指甲、按摩,和他聊天”^{[6]30}。朗德罗定期过来帮皮斯太太清理房间杂物,“朗德罗把躺椅、杂志架、电视机和电视柜从地毯上挪走,加入清水……”^{[6]31},同时检查皮斯太太药品是否齐全,有没有过期,陪皮斯太太聊天,缓解她的心理压力。“朗德罗还给巴普的狗洗了澡,纯粹是为了让她开心。还给自己和奥蒂蒂做了三明治,没有汤汁的那种”^{[6]296}。

在认知层面上,优秀的治疗师的重要的技能包括倾听和移情的能力^[21]。病人有强烈的愿望被理解,被尊重,被信任。信任本身是治疗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22]。当朗德罗不小心射杀了邻居家的儿子,而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时,兰德尔采取了汗蒸的方式,在汗蒸的过程中,耐心倾听朗德罗的倾诉,并且宽慰他,排解他内心的悲伤,“朗德罗一直在不停地哽咽,兰德尔由他哭了一会儿”^{[6]61},“以后别再哭了,除非为那孩子难过”。在认知层面上,一个好的医生治疗师将需要以适合患者语言和文化的方式进行交流。他可能需要激发病人的情绪,让他们释放自己的情绪。在治疗的最后兰德尔搬进来更多的石头,把干草放在石堆上,“让我们痛痛快快来一场,我要把你整个人活煮了”^{[6]63}。

四 和谐、爱——现代人的生命药方

有学者提出“全球南方文学”的概念,指出其通过“地下”叙事、口述、反讽、对话和戏仿等方式质疑、挑战霸权文化意义和价值观、获取自主权和反殖

民化,如印度作家色拉帕蒂和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等等^[23]。比尔·阿西克洛夫特指出,“语言别具一格的运用、反讽及不连贯叙述,都已成为后殖民文学的特色,都强化了后殖民现实框架里的语言和地方的分裂”^[24]。对于白人商人麦金农的描写,“麦金农松软的肚子像膀胱一样胀得鼓鼓的”“双腿像螃蟹腿似的”“牙齿黑乎乎的”“口气臭得能把人熏到逃到一边去”“鼻毛上粘着鼻涕”^{[6]116},作者用辛辣讽刺的言语刻画了一个肮脏、满身铜臭的白人形象,借此抨击西方殖民者的丑恶嘴脸。奥蒂身患糖尿病,在治疗时候,“他们在他身上插满透析用的管子,像个抽水马桶一样,慢慢死去真是件无聊的事情”^{[6]297}。作者用“抽水马桶”“慢慢死去”揭露了殖民医学的荒谬,讽刺了西方科技理性的荒唐以及失败的命运。小说中特拉维斯神父以传播西方基督教,同化保留地人的思想,治疗保留地人的精神创伤为己任,最终神父对自己的身份也充满了厌倦,嘲讽上帝,“有波兰的上帝吗?喜欢香肠和波兰饺子的上帝。神秘、精明、世俗的上帝,遇事老想不开”^{[6]327}。并且像“那不可知的力量祈祷,那不可言喻的造物主、飞鸟、山峦、河流、海洋,爱与善”^{[6]327}。作者借神父之口,用略带戏谑的言语,嘲弄西方上帝,也是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文化价值观的有力抨击。另外,作者刻画了恶作剧形象桑德奶奶,她给拉罗斯讲述印第安创世神话,“纳纳波宙就像他们的耶稣一样……但是是总爱放屁的那种,那些天主教认为是魔鬼、是原罪在背后迫害我们。眼下是白人的所作所为在迫害我们。那是精神创伤”^{[6]348}。桑德奶奶通过略带幽默的言语,揭露了白人的殖民历史,力图消解白人官方殖民话语的束缚,打破不善言辞、野蛮与悲剧的印第安刻板印象,同时也是印第安人以反抗谋求生存、传承部落文化的重要方式。

任何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都摆脱不了社会因素的影响,科学知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具有一定的历史地域性,都有存在的合理性,都是平等的,而某一思想成为信念,为人们所接受,并不是它具有一定的真理性,而主要依靠宣传和权力。所以两种信念之间不存在好与坏的区别,任何一方都不具有优越性^[25]。因而殖民地作品常常试图使欧洲的现代性乡土化、使欧洲话语他者化,以显示西方科技的局限性。描述那些与现代性相遇的话语具有一定的讽刺意味,能够批判西方文明和进步的优越性主张,揭示本土大众对盲目痴迷西方文化者的否定和批判^{[15]131}。自从西方科技理性入侵后,皮斯太

太被各种疾病侵袭,“她得过大大小小的病——神经痛、牵扯全身的偏头痛、骨质疏松、脊椎病、红斑狼疮、骨癌”^{[6]27}。四代拉罗斯都感染了肺结核,保留地的人们被各种疾病折磨,同时,西方理性也给传统生活方式造成危害,彼得被各种信用卡和债务压得喘不过气,“黎明悲伤而平静,大笔的债务也随之而来”^{[6]72}。他渴望回到最初的生活方式,“到那时,信用卡公司消失,银行体系瘫痪,一切都将回到以金条交易的时代……”^{[6]52},奥蒂曾经是个厉害的摔跤手,现在整个人胖得像海豹一样,家族里的人大多死于糖尿病并发症^{[6]31}。西方理性给当地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殖民话语具有复杂性和矛盾性,反殖民者通过挪用、修正、认同、接受、同化殖民者权利话语等方式实现社会现代化^{[15]130}。面对西方理性的入侵,作者通过沃尔弗雷德与第一代拉罗斯的婚姻关系、神父与艾玛琳的情人关系,隐喻了两种文化的对抗过程,最终西方文化被东方文化所“同化”,东方文化战胜了西方文化,暗示了东方文化的旺盛生命力。第一代拉罗斯与白人沃尔弗雷德的婚姻关系是一种“同化”,隐喻了西方被东方所同化。刚开始,沃尔弗雷德对她充满了种族偏见,“她算是野蛮人里面很聪明的了”^{[5]66}。第一代拉罗斯说,“可她不愿意成为他的所有物,于是画了一朵花”^{[6]169}。第一代拉罗斯感觉到了他们不平等的关系,隐喻了两个民族以及两种文化的不平等关系。在第一代拉罗斯被送往寄宿制学校期间,沃尔弗雷德“花了更多时间和她的同伴在一起,一起狩猎、一起交谈,一起参加仪式”^{[6]172},“他正逐渐变成一个印第安人”^{[6]172}。拉罗斯从寄宿制学校出来后,“她端详着沃尔弗雷德。他好像已经变成了印第安人”“他已点起了烟袋吸烟,烟草散发着芳香,因为里面有鼠尾草和红柳皮”^{[6]291}。白人沃尔弗雷德最终认可了印第安文化,并且被“同化”成为了一个“印第安人”。“他们在浆果丛里翻滚,把果实碾成血红的汁液,像刚出生的婴儿一般。一切都有可能变成现实,他们将结为夫妇,像芸芸众生一样尽情生活”^{[6]220}。同时,艾玛琳与特拉维斯神父的情人关系也是一种“同化”,艾玛琳代表当地本土文化,神父是西方理性主义的代表。他经历了战争的摧残,“他脖子上数条疤痕蜿蜒盘曲而下,疤痕不仅留在皮肤表面,也烙印在内心深处”^{[6]38},战争导致了他身体的残缺,也让他自己的宗教信仰动摇了。“你不该再继续编造不同的上帝了,像普通人一样想象一位上帝吧”^{[6]325},意味着他

对天主教信仰的抛弃。“我到底怎么了,怎么会和她说我爱你”^{[6]370}。他对艾玛琳的追求,暗含着对本土文化的追寻。最后“别人都在家里看战争新闻,这儿只有他和艾玛琳”^{[6]370}。神父最终和艾玛琳在一起了,也表明他被本土文化所“同化”。

在追求技术进步的20世纪,人类患有的所有疾病都是现代性的疾病。“在现代化中,爱正是解救现代社会的良方”^[26]。罗密欧和朗德罗本是好朋友,在逃离寄宿制学校时,为救朗德罗不慎摔伤,在自己的所爱艾玛琳嫁给了朗德罗后,罗密欧对朗德罗充满了怨恨,并采取报复行为,无果。之后,罗密欧意外从楼梯上摔下来,腿疾莫名其妙地好了,又与朗德罗和好如初。小说采取这样的情节描写,暗示了只有爱才能化解创伤,治疗疾病。同时,小说以两家聚会结束,祖先也预言,罗密欧的儿子霍利斯和朗德罗的女儿终将成为幸福的一对,也暗示了唯有和谐、爱才是解救生命的药方。

五 结 语

医学人类学者凯博文认为,“透过疾病可以立察整个民族所展现的文化原则和隐藏的政治社会影响”^[27]。我们进一步发现,前四代拉罗斯感染肺结核,作者用“肺结核”揭示当地殖民的事实,揭示了以西方医学科技和殖民医生哈尼弗特·埃姆斯为代表的西方理性带给印第安民族和文化的灾难,而印第安整体医学中的健康观、仪式与音乐疗法中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与人相互联系、和谐、爱的文化整体观则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小说还进一步讲述了第一代拉罗斯和白人沃尔弗雷德的婚姻关系、神父与艾玛琳的情人关系,第五代拉罗斯治愈两个家族的创伤过程,其目的是为了揭示本土文化话语的胜利,赞颂印第安文化中的和谐、爱的文化整体观,批判了短暂的西方理性。

[参考文献]

- [1] 张有春. 医学人类学的社会文化视角[J]. 民族研究, 2009(2): 57-66; 109.
- [2] 王曙光, 张胜康, 吴锦晖. 疾病的文化隐喻与医学社会人类学的鉴别解释方法[J]. 社会科学研究, 2002(4): 86-92.
- [3] 蒋天平. 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帝国医学想象[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15.
- [4] VINOD VERMA. Holistic Medicine in India and the West [J]. India International Centre Quarterly, 1991, 18(2/3): 7-20.
- [5] [美] 苏珊·桑坦格. 疾病的隐喻[M]. 程巍,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 [6] [美] 路易斯·厄德里克. 拉罗斯[M]. 张延俊,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0.
- [7] LAURA ORIS. Membranes: Metaphors of Invas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Science, and Politics[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68.
- [8] LIEBEN RICHARD. The Field of Medical Anthropology. Culture, Disease, and Healing[M]//D LANDY. Studies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Macmillan, 1977: 14.
- [9] 蒋天平. 社会构建论下《霍乱时期的爱情》对殖民医学的逆写[J]. 国外文学, 2020(4): 125-134; 157.
- [10] WARWICK ANDERSON. Colonial Pathologies: American Tropical Medicine, Race, and Hygiene in the Philippines [M].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7.
- [11] JHON EHRENEICH. The Cultural Crisis of Modern Medicine[M].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15.
- [12] 张慧荣. 分裂观与整体观:《典仪》中的精神创伤治疗[J]. 国外文学, 2011(2): 145-151.
- [13] WILLIAM H YORK. Health and Wellness in Colonial America[M]. Oxford: Greenwood, 1911: 44.
- [14] [法]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 结构人类学[M]. 张祖建,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171.
- [15] TURNER VICTOR. The Drums of Affliction[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and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1968.
- [16] 连冬花. 社会构建论视角下的中西医之争[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2007(5): 15-18.
- [17] ANGELL M, KASSIRER J P. Alternative Medicine: The risks of Untested and Unregulated Remedies [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1988, 339(12): 839-841.
- [18] 杨玉兴, 权元文, 杨艳斐, 等. 关于五行音乐疗法的哲学思考[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5(8): 2759-2762.
- [19] KLEINMAN ARTHUR. Concepts and a Model for the Comparison of Medical Systems as Cultural Systems[J].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1978, 12(2B): 85-95.
- [20] DIXON D M, SWEENEY K G, GRAY D J. The Physician Healer: Ancient Magic or Modern Science? [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General Practice: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 1999, 49(411): 309-312.
- [21] GORDON K MACLEOD. Empathy and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 Beyond pills and the scalpel[J].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994, 271(13): 1042-1043.
- [22] TOOMB S K. The Meaning of Illness: A phenomenological account of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physician and patient

- [M]. Springer-Science and Business Media, 2013:10.
- [23] MOHANTY P SATYA. Colonialism, Modernity, and Literature: A view from India[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1:22.
- [24] [澳大利亚]比尔·阿西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 逆写帝国[M]. 任一鸣,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24.
- [25] 连冬花. 中医是科学:社会建构论的视角[J]. 学术论坛, 2007(4):32-35.
- [26] MARQUEZ G G, CLARFIELD A M. Novel Medicine: Love in the Time of Cholera[J].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2007, 100(2): 107-107.
- [27] [美]凯博文. 谈病说痛:人类的受苦经验与痊愈之道[M]. 陈新绿,等译. 广州:广州出版社,1998:257.

Tuberculosis and the Disput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Medicine Cultures in *LaRo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cal Anthropology

JIANG Tian-ping, LI Sha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LaRose* is the final work of Louise Erdrich's "Justice Trilogy". Through the fact that four generations' *LaRose* in the family are all infected with tuberculosis, this work discloses the Indian nation's colonization histor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edical anthropology and the perspective of colonial medicine, this paper criticizes the dark corruption of colonial rule and exposes the hypocrisy of western colonists by analyzing the cultural metaphor meaning of tuberculosis. At the same time, it reveals the disaster brought to Indian nation and culture by western rationality represented by western medical technology and colonial doctor Hanifert Ames. The holistic view of Indian culture, the mutual connection among people,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harmony and love, reflected in holistic medical treatment, such as, wellness, music and ritual therapy, is full of exuberant vitality. Thus it questions the progress of colonial medicine and the western rationality. It also shows the validity of the holistic view of eastern medicine and the perpetuity of eastern culture.

Key words: *LaRose*; medical anthropology; tuberculosis; holistic view of medicine

(本文编辑:刘衍永)